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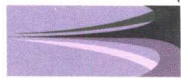
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

梁肇庭 (Sow-Theng Leong) 著 冷剑波 周云水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K281.1
2014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主编 邱国锋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 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

梁肇庭 (Sow-Theng Leong) 著 冷剑波 周云水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梁肇庭著；冷剑波，周云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ISBN 978-7-5097-5087-2

I. ①中… II. ①梁… ②冷… ③周… III. ①客家人-移民-研究-中国 ②客家人-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4014 号

·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

——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

著 者 / 梁肇庭

译 者 / 冷剑波 周云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杜若普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3.5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 201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2012-1201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087-2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丛书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丘小宏 刘志伟 何星亮 陈春声 周大鸣
房学嘉 麻国庆 谢重光

主 编 邱国锋

副主编 肖文评 周云水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冷剑波 宋德剑 吴元珍 河合洋尚
钟晋兰 夏远鸣 谢胜利

《海外客家研究译丛》

总 序

目前，全世界有两种人是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热门，一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二是中国的“客家人”。客家人保留着古朴的客家方言，有其独特的民俗与文化心理。客家研究自一开始就呈现出其他文化少有的国际性特征和优势。学术界对客家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西方传教士在客家地区传教过程中记录的大量实地材料。^① 英国传教士艮贝尔（George Compbell）长期在广东梅县等客家聚居地传教，对客家的历史和现状作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研究。1912年，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在汕头举行关于宗教的会议，艮贝尔在会上就客家问题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指出，“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自由，普通山居的民族大都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并预言客家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奋发和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② 会议结束之后，上海英文《教务杂志》发表了艮贝尔的报告。同时，艮贝尔又以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Hakkas* 为书名（中译名《客家源流与迁徙》）刊印了这份报告的英文单行本。艮贝尔报告的理论价值在于运用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考察客家的历史，以发现客家的迁徙活动也是验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的论据，并认为它和“种族特性”的养成有因果关系，故而引起西方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将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结合起来，研究人类的“族性”课题。艮贝尔的《客

① 张英明、周璐：《西方学者早期对客家与太平天国关系之研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②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第1页。

家源流与迁徙》给了亨廷顿极为有益的启发，他认为“一切文化发生变迁，可以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来直接解释”，并指出还需要从“人口过剩与移植所引起的自然淘汰求之”^①，将艮贝尔来自田野调查的创见上升为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国民族性”的一种新的理论预设。亨廷顿不仅提出“客家的名称，英文是 Hakkas，在人类学上已有相当重要的地位”^②，还极力主张对客家这一独特的群体开展科学和规范的研究，认为客家人的历史很值得研究。1924 年，亨廷顿以艮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徙》为资料基础，用自然淘汰和人口迁移的原则来解释中国的民族性，在美国出版专著 *Character of Races*（中译名《种族的品性》）。他对客家特性养成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指出客家人在历史上因受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压迫，不得不展开漫长的迁徙之旅。“当他们迁徙时，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会活动，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后面。所以凡能够到达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有才干的。”^③ 亨廷顿强调“民族特性”是自然淘汰作用的结果，认为迁徙也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筛选过程。对于当时的西方人类学界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清朝中期以来，岭南“土客之争”日趋频繁激烈，客家人不仅受到客居地原住民的经济抵制，而且受到他们的文化拒斥，被视为“苗蛮之种”。因此，历史上岭南“土客之争”在文化上的深层次症结是族属之争，亦即客家人的文化身份之争。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出版之后，由于客观上适应了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及其崛起的需要，故而深受客家文人和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1815 年以来，客家文人徐旭曾著《丰湖杂记》，力争客家具有汉族的正统性；黄钊著《石窟一征》，力称客家方言为“中原正音”；林达泉著《客说》，力辩客家为“唐虞三代的遗裔”；古直著《客人对》，力说客家“诗书礼乐”文化之盛；钟用稣著《客家考源》，力论客家为中原嫡系之后裔，等等。在这个时期，客家文人学士著书立说，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建构作了文化谱系方面的准备，同时也促进了客家族群意识的觉醒和抗争。

20 世纪 20 年代，客家文人乃至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成果及其理论方

①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印书馆，1989，第 6 页。

② 亨廷顿：《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潘光旦译，新月书店，1929，第 172 页。

③ 亨廷顿：《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潘光旦译，新月书店，1929，第 120 页。

法引起重视。钟鲁斋将艮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徙》译成中文，于1923年在旅沪嘉应学生会主办的《嘉应》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粤东人种”亦即客家问题的重视以及研究工作的展开。顾颉刚、洪煊莲、罗常培、李济之、潘光旦、范捷云、乐嗣炳等著名学者，都努力进行或热心提倡客家研究。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率先将“粤东人种”问题列为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并物色合适人选担当此任。客家学者罗香林1930年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留任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由于罗香林具有客家背景和相关的治学经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委派他返回岭南故乡，实地考察“粤东人种”问题，并负责编辑《客家史料丛刊》。从此以后，客家研究从岭南客家文人圈步入中国学术界的殿堂，逐步发展成为学术界中的一门显学——客家学。

客家学是我国人文学科中的一颗明珠。它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是在综合众多的人文学科，诸如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客家学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形成和发展规律。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由于涉及领域太多，要真正达到学术上的飞跃突破，绝非一朝一夕之易事。

海外的客家学研究有着相当悠久、丰富的实证和理论传统，中国的客家学研究必须与之交流，在本土研究与国际学术充分交流基础上构建真正领先世界的客家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嘉应学院客家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客家学界的重要阵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客家学研究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客家学研究为何能成为“显学”？这些华南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的人群，为何、又是何时开始被当做一个有着自身文化及地域特征的群体而被反复讨论？客家学研究的主题到底有哪些？哪些有意义，哪些纯粹是臆测？这些主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通过一种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作用，而产生某些政治、经济及至文化权力的诉求与争议的？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于2011年2月启动了“海外客家研究译著特别项目”，计划翻译和出版海外知名客家研究著作10部，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协议。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拟先行翻译和出版海外客家研究著作6部，兹简列如下：Ellen Oxfeld. 1993. *Blood, Swee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 Chinese Community (欧爱玲:《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icole Constable. 1994.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郭思嘉:《基督徒心灵与华人精神:香港的一个客家社区》).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Ellen Oxfeld. 2010. *Drink Water, but Remember the Source: Moral Discourse in a Chinese Village* (欧爱玲:《饮水思源: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话语》). 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 Sow - Theng Leong. 1997.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Press* (梁肇庭:《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人、棚民及其邻居》). Standord University Press; 瀬川昌久:『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イとその境界』, 風響社, 1993. (瀬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 河合洋尚:《日本客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百年的轨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让大陆客家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国外、港澳台地区的客家学研究成果,大力促进客家研究的国际交流,推动客家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组织这套丛书的翻译和出版。嘉应学院地处海内外最大的客家聚居地,具有开展客家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被列入丛书的这些著作素来被视为海外客家研究的范本,体现了不同的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希望这些论著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客家学界的关注,促进客家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客家学既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就需要不断汲取新的养分,允许“百家争鸣”,重视不同意见,不断欢迎新观点。在专家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下,“客家学”研究终将达到学术上的逐步突破,臻于完善。我相信,零散的力量若能相对集中,累积的效果必将十分突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还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推进学术、造福社会的美好夙愿,让我们共勉,并把这愿望变成具体的行动!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 邱国锋

2012年12月18日

于广东梅州

西方人类学家视野中的客家学研究

代 序

罗力波*

近 15 年以来,在诸如孔迈隆(Myron Cohen)、郭思嘉(Nicole Constable)和欧爱玲(Ellen Oxfeld)之类的西方人类学家对客家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之后,客家学研究发展最明显的趋势是理论视角的多样性,而这对于理解客家认同及其在当代全球化世界里所承担的意义是必不可少的。客家族群性的很多特点让客家研究对当代人类学研究富有吸引力。

首先,当代的客家研究代表了更广泛的汉族经验,有助于对当今汉民族的内涵产生普遍的理解。例如,欧爱玲对道德话语的研究正好切合了中国很多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认为这类道德问题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迅速市场化的结果。欧爱玲强调城市和乡村对道德问题的反应差异,她正确地假定梅县客家村落的经验,可以用于理解中国其他乡村地区类似的经历。

其次,客家族群的特点使得客家研究与当代的人类学研究尤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离散族群,对客家的研究将特定的文化机制和社会过程推到了最前沿,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对社会结构和全球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影响。正如我一直坚持的观点那样,在中国作为一个客家人,一定会与跨国进程紧密相连——其实,即使最偏僻的客家村落也是一个全球化的

* 罗力波(Eriberto P. Lozada Jr.),美国戴维森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特聘教授,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客座教授。专著有《神在人间:天主教堂、后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个中国村庄的跨国过程》(*God Aboveground: Catholic Church, Postsocialist State, and Transnational Processe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村庄，因为人群、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是跨国流动的。从历史的观点上说，移民在客家人的经验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在世界各地都有关于客家的人类学研究，比如在印度、牙买加、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加拿大和美国等。这些研究阐明了客家人为适应寄居国的社会条件运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这种移民经历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生活的主要特质，已经成为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世界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的各个方面，可以极大地有助于理解族群是如何适应移民的。实际上，移民理论的顶尖人类学家可能就已经研究过客家。我以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华森（James Watson），就一直研究香港的文氏家族达40年之久。文氏后裔移民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地方，在剑桥和麻省都有文氏后裔居住，还有一个是他在哈佛大学教过的本科生。然而，香港的文氏家族却把他们的祖先追溯到江西吉安县的文天祥。

再者，客家这一独特族群在世界不同地方建立了社区，这导致在社会科学里难以定位的事情出现了——用科学术语来说，这是一项“自然实验”。因为客家宣称其文化具有一致性，即使他们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经历截然不同的历史细节，也可以在反应和经验方面开展更直接比较。离散族群因为太过多样化，所以很难进行分类，至少无法按照萨夫兰（Safran）的经典定义加以划分。例如，若把汉族当做一个离散的群体，那么在汉族内部必然具有极丰富的多样性，因而很难可靠地对离散群体进行直接比较。考虑到不同的历史场景、方言和其他文化标记，广东人在纽约的经验，是否可以有效地拿来与福建人在欧洲或苏北人在非洲的经验相提并论呢？

这引出了我对客家研究重要性的最后一个看法。因为历史场景和当代社会政治背景的多样性，对于客家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同样也有极大的多样性。印度的客家人移居加拿大、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后，是否还会认为他们自己是汉人呢？我的学生郑仪华在印度的研究表明，她在田野调查时所调查的人只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却很少意识到自己作为汉人或海外华人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的经验完全不同于广东人在旧金山的后裔。在最近一次到中国台湾的旅行中，我遇见的年轻的政治积极分子对此问题的反应也很特别。当他们的父母坚决地认为自己是汉人，而岛民或台湾人只是一个重要标记时，他们却坚持认为自己首先是台湾人，这甚至排在中国人或者华人的身份之前。在文化多元化的中国台湾社会里，客家人意味着什么？正如王力军

(Wang Lijun) 所言, 牙买加的客家人有强烈感觉自己是华人的观念, 这与中国台湾的情形大不相同。这种强调诸如族性之类的认同的传统形式是全球化的结果, 而且在强调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里, 它对有关文化的真实性、融合、认同和其他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产生影响。

至于客家研究为何在人类学研究中居于中心地位, 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视角, 但我认为这些是当代人类学研究最突出的问题。对当代人类学研究领域内的客家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 我想提出个人的建议。社会和文化过程的互联性, 已经促使交叉学科发展, 这意味着学术界正在应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论, 以回答他们各自研究的问题。在广义的层面上看, 这表明我们需要复合的方法论, 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相互结合。例如, 哈佛大学的包弼德 (Peter Bol) 教授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在对地方历史进行分析时, 合并出地理信息系统 (GIS), 这种方法论重点依赖于信息科技。客家学的研究也可采用多种方法论, 在方法和理论分析上, 囊括更多的跨学科方法。

广东梅州具有“世界客都”的美誉, 是全球客家人向往的心灵家园。嘉应学院作为梅州地区唯一的高校, 拥有很强的客家学研究队伍, 而且已经推出了跨学科研究的丰硕成果。作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主动承担起推介海外客家研究成果的重任, 这无疑是国内客家学研究的一大喜事。在此, 我谨代表众多在客家地区尤其是在梅州客家乡村进行过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 向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致以崇高的敬意, 祝愿客家研究院的诸位同人“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感谢译丛主编及副主编的厚爱, 期待将来能在海外读到更多优秀的客家学研究专著。

是为序。

农历壬辰年冬大雪日

于广东嘉应学院亮湖楼宾馆

编者序

梁肇庭教授 (Sow-Theng Leong) 于 1987 年逝世。很遗憾，本书只能在他过世以后，由他的朋友我来整理出版。梁教授生前留下了许多关于客家和棚民的文章及研究资料，Vickie 梁女士询问我是否能将这些材料整理出版，我欣然接受，本书即是我整理的成果。

梁教授 1939 年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华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前往美国读大学，他最先在布兰第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学习历史，以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后，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 1969 年成功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除了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前，曾有过一段在马来西亚短暂教书的经历外，梁教授正式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是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1971 年，梁教授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研究所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从事研究工作；1974 ~ 1984 年间，梁教授任教于墨尔本大学历史系 (Melbourne University)；1985 年，他又前往澳洲西部的默多克大学 (Murdoch University) 从事亚洲研究。在同事眼中，梁教授为人低调务实，能积极参与大学里的许多事务，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澳大利亚对于亚洲的研究。一直以来，梁教授受到同事和学生们的广泛好评。

梁肇庭教授毕生所从事的研究，让他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梁先生早期主要的研究兴趣是中苏关系史。在这一研究领域，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研究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他可以熟练使用英文、日文、俄文和中文，利用这些文种的出版物以及档案材料，特别是

利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部”档案资料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有两部著作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一部是《中苏关系：第一阶段（1917～1920）》，另一部是《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这两部著作至今仍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基本论著。对于中苏关系研究，梁先生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贡献，涉及沙俄入侵东北、中俄当代外交政策等方面。梁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始终贯穿他学术生涯的始终，梁先生去世之前正在写的一篇重要论文是关于孙中山与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梁先生后来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社会史，并开始从事客家历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是一位客家人。

我们这些有幸认识梁教授的人会怀念他，这种怀念不仅仅是因为他杰出的学术和专业成就，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我相信曾经与梁教授接触过的每个人都会非常珍视和怀念他的无私、友善和不着痕迹的幽默感，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列举出一些他曾经在生活中坚持不懈地帮助别人的小事情，从这些不经意的小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高尚的人格。

本书可以当做我们对梁肇庭教授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和一个善良的普通人的致敬。

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工作主要有哪些。本书所有的基础研究、主要观点以及知识性投入，都属于梁肇庭先生。此外，经过一番思考，我认为增加一些梁教授去世后国际学术界出版的重要相关成果，作为文献参考，可能会更有益于读者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因此，尽管我没有尝试也不曾思考增加一些独立的工作是否合适，但我还是冒昧地在一些地方做了补充分析，这些补充分析主要是运用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的例子用括号作为标记）。另外，在梁先生原稿上做的最重要补充是增加了地图，这些地图由施坚雅教授（G. William Skinner）提供。作为本书的编者，我也通过这些地图做出了一些推论性的阐发。

梁肇庭教授去世前正着手就客家人、棚民与后来成为客家的畲族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研究，但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没有能够完成。

因此，本书知识性的内容完全是原作者的贡献，但我仍然必须对本书的终稿负责。梁教授生前留下了三篇内容翔实（有部分内容重叠）的重要论文，这三篇论文的主题分别是关于族群性和移民、近代中国岭南的客家人（唯一已经出版的一章）和棚民。我将这些文章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以便让篇章结构以及一些引言和结论更趋于完整。本书不太可能核对所有引用的原始材料，因其中许多是来自非常罕见的地方志书，如果读者能指正其中的错漏，我将非常感激，以便我们在第二版时加以更正。

我非常确信，如果梁教授在世时能看到本书出版，他第一个要感谢的肯定是施坚雅教授，施坚雅教授关于中国研究的巨大理论成就在本书的每一章中都可以显现。同时，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施坚雅教授对我的支持和指点也非常宝贵。施坚雅教授不仅撰写了本书的序言，另外还根据他丰富的理论知识提供了大量地图，这些对本书都是非常大的贡献；此外，施坚雅教授对于本书的手稿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Mary Erbaugh, Danny Kane, Harry Lamley, Lo Hui-min, Susan Mann, Susan Naquin, Evelyn Rawski, Jon Unger 和 Wang Gung-wu 等都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作出大量贡献，他们不断地鼓励我将这项工作进行到底。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贝尔（Muriel Bel）先生、贡德（Richard Gunde）先生和麦克布莱恩（Nathan MacBrien）先生，也付出了很多努力，让复杂的书稿变得更加清晰、简洁和容易阅读。

书中的所有地图和图片由施坚雅教授提供，而且他还十分慷慨地资助了本书大部分的出版经费。凭借精湛的技艺，Chessy Qi Si 帮助开展了地理信息系统和地图的制作。《中国时空》（China in Time and Space）的导演 William Lavelly，非常无私地提供了相关数据和技术帮助。Lawrence Crissman 先生非常慷慨地提供了以 1:100 万比例呈现的基础水文数据图，这一材料来自他在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所做的中国地理信息系统项目（China GIS），另外他还提供了来自《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电子化地图。书中的海拔轮廓图来自《世界数位图库》（Digital Chart of the World）。

制作各种图表的经费来自默多克大学的一个特别授权研究项目，对此我要特别表示感谢。我同时也要感谢默多克大学人文学院在本项目的最后阶段提供的经费资助。Wang Yi 帮助翻译了一些较难的段落，Anna Clark-Doyle 和 Anne-Marie Brady 也参与了书稿的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此外，梁教授关于客家问题的最初研究也得益于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grant）的经费资助。

最后我要感谢美国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

是《岭南的客家人：近代中国的族群性与社会变迁》一文的修订版，此文发表在由 David Pong and Edmund Fung 主编的《理想与现实：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迁（1860 ~ 1949）》（美国大学出版社，马里兰州拉纳姆，1985 年）一书的第 287 ~ 326 页上。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在梁教授不幸去世后，Vickie 梁女士为本书的最终出版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她为这一耗时长久的出版计划提供了富有耐心和十分坚定的支持，没有她就没有本书的问世。通过本书以及对梁肇庭学术纪念基金（S. - T. Leong Memorial Scholarship Fund）的管理，Vickie 梁女士让人们对梁肇庭教授的怀念永远存在于他所在的大学以及学术界中。

蒂姆·怀特（Tim Wright）

默多克大学

序 言

关于中国历史上省、州、县的行政区域划分在中国国内外都已有很好的共识。在清朝帝国的晚期，个人身份的关键因素，即一个人的户籍，总是据其所在的行政区域来认定。中国的学者一般将用来管理帝国版图的国家行政区划系统作为其学术研究和分析的唯一框架。在学习中国语言以及研读中国前辈的经典著作时，西方汉学家自然地也采用了同样的分析模式。

对于中国国土强烈的行政区划概念，阻碍了人们看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等级结构，即经济中心和其腹地之间的层次结构。在多数情况下，对于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形成，一个地方在其所属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比起政府的行政划分来得更为重要。在本书中，梁肇庭用这一观点来分析族群性和移民。此外，他的研究表明，只有运用中国区域系统的动态分析结构，客家人和棚民扩张的整个历史图景以及族群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变得容易理解。本书之所以有重要价值，不是因为它大胆的描述、新颖的发现和精辟的诠释，而是因为它的史学视野。利用区域系统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书第一次将其由可能变为了现实。

几年前，有位历史学者写了一篇关于棚民的文章（可以说相当的繁复），来描述他们的迁移：“从内陆迁移到福建西部和广东东北部山区，从那里他们又越过山脉迁移到了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① 梁肇庭同样描述了这一移民现象，但只是将它置于东南沿海大区域的外围、岭南大区域的北边、湘赣区域的边沿，以及长江下游大区域的南部（紧邻赣—长江巨区和东南沿海大区域）这样一些区域里来进行分析。这与前人的描述产生

① Averill, Stephen C. "The Shed Peop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Yangzi Highlands." *Modern China*, p. 87.

了极大的不同。定居在各区域的边缘，同时又靠近主要的商业中心，这是客家与棚民迁徙的最鲜明特点。但要阐明这一点，需要考察中国的区域系统及其内在的“核心—边缘结构”。

我在此序言中的首要任务是阐明中国中南部地区的区域系统结构，而这一地区正是客家人和棚民的故事逐步展开的地方。在欧亚农业文明社会（以农业为基础）里，一般情况下有河流经过的盆地往往会形成比较发达的经济区域。在16世纪的中国，长江流经的四个主要盆地各自支撑了一个大区域，岭南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类似的情况。东南沿海大区域的形成，是因为连接区内各主要港口的航道使其一体化，它的内部结构非常独特，其内部因地理因素形成的四个子区域各自发展为一个离散核心区。

要证明这些区域系统的“核心—边缘结构”有无数种方法。耕地、人口和资本投资等关键资源集中于一个流域的下游平原地区，这里就会发展为核心区，而周围山地则成为边缘区。由于森林的砍伐、地表的侵蚀和沉积导致山区土地肥力降低，边缘地区生产力低下；农业在核心区域耕作更加精细，生产率更高，灌溉和开垦的潜力在平原地区也较山区更大。此外，核心区域相较边缘地区享有更大的交通优势。在运输以及交通网络的效率方面，核心区域也较边缘区域来得更高。城市系统也反映和强化了核心—边缘的分化，比较发达的城市都集中在核心区域，而边缘区域则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较小。同时，核心区域的商业氛围也较边缘区域明显更强。核心区的宏观经济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处于一个区域的顶点：经济交易最为活跃；各类产品的市场化最为发达；金融服务业和大型批发业最为集中；工业化生产规模也最大。

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东南部的每一个强势方言群都占据着一个大区域或其子区域的核心地带。在长江下游地区，吴语群占据了太湖区域；东南沿海大区域所属的瓯江—灵江次区域，也是由说吴语的瓯江人占据。东南沿海大区域的其他三个子区域的核心区，分别被说不同闽语的群体占据，分别是闽江流域的福州话群体、漳州—泉州区域的闽南语群体以及韩江流域的潮州话（福佬话）群体。在其他区域，广州话群体占据了岭南地区的核心地带——珠江三角洲，赣语群体占据了赣江流域的鄱阳湖平原，湘语群体则占据了位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平原。在中国中南部的所有主要文化群或者说方言群中，只有客家人没有占据属于他们自己的较大的平原地区。